

现代化视域下的亚当·斯密

胡怀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哲学体系,不仅为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开启的英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其关于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学术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亦具有重要启发。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围绕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普遍勤劳和资本积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不仅为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而且对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一定启发性。

关键词: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5-0021-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亚当·斯密,更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就尝试构建了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哲学体系和理论经济学体系,不仅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具历史穿透力的理论回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值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之际,在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其学术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的有关学说,而且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并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发。

一、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

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并渐次形成了与之适应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或如马克思总结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传统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盛、宗教改革和民族意识及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欧主要国家率先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夹缝中不断积累着现代性因素,并最终催生了直接面向现代社会秩序的18世纪启蒙运动。对于18世纪西欧各国的启蒙运动,胡怀国曾指出,“如果说,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冲突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那么启蒙运动则是在此基础之上,集中为世俗世界本身缔造现实的社会

收稿日期:2023-06-14

作者简介:胡怀国(1971-),男,山东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秩序。对我们而言,前者是近乎遥远的背景音乐,而后者则是对我们有着强烈震撼的现代摇滚。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是在启蒙运动的启发下不断发展而来的”。^[3]从某种程度上讲,18世纪盛行于西欧各国的启蒙运动,尝试构建的是一种面向现代社会秩序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各自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具体而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起,不断在边际上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状态,同时也为重塑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关系的宗教改革不断积累着物质要素;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而且推动了17世纪自然法的近现代转型,并最终孕育出了直接面向现代社会的18世纪启蒙运动。对于17世纪的自然法转型,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萨拜因曾指出,“对17世纪的哲学来说,关系始终显得不及实体那么可靠;人是实体,而社会则是关系。正是这种假定的个人优先性成了自然法理论所具有的最显著且最持久的品格,也是现代理论区别于中世纪理论的最为明确的地方。”^[4]如果说,17世纪的自然法转型是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那么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一次飞跃,它们共同为人类社会成功开启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滋养。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不仅分别为英国、法国和德国开启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分别结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硕果。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结合西欧各国现代化特别是以工业革命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英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19世纪的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欧各国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实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理论飞跃,同时也为20世纪的中国成功开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对独特又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更多承袭自然法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倾向于通过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诱发激烈政治行动的法国启蒙运动,亦异于更多强调

“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5]并倾向于借助人的主体性、绝对精神和自由意志构建庞大抽象体系的德国启蒙运动,以1727年大学改革后的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更多是在对自然法近现代转型成果进行个体心理经验主义的苏格兰式改造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极具理论弹性和张力并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学术性思考和整体性框架,并率先催生了一种以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英国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按照格劳秀斯(1625年)“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的自然法,人类社会必须按照“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6]重构现代社会秩序,格拉斯哥大学首任道德哲学教授卡迈克尔通过评注、英译和出版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1673年),把自然法传统及其近现代转型成果引入了苏格兰学术界。格拉斯哥大学第二任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利用沙夫茨伯利的情感主义对有关自然法传统进行了心理经验主义的苏格兰式改造,初步构建了一种“把人们引向最有效地倾向于促进其最大幸福和完善”^[7]的道德哲学体系,并由此确立了其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历史地位。作为哈奇森的学生和格拉斯哥大学第四任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年)中借助于“同情”“设身处地的想象”“公正的旁观者”“合宜”等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构建了一种逻辑更为严谨、体系更为完备并充满理论弹性和张力的道德哲学体系,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秩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具历史穿透力的整体性框架。

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尽管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8]¹⁰¹⁻¹⁰²但同时也拥有一种“设身处地想象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公正的旁观者”,使得人们能够有力地“纠正自爱之心的天然曲解”并作出“合宜”的反应,而合宜的情感和行为就是道德哲学旨在探讨的“美德”。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分别从“对别人幸福的关心”和“对自己的幸福的关心”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主要结论是“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8]³⁴²其中,“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

作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8] 106}正是由于“正义”美德的极端重要性,现代社会一定是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的社会;正是由于“仁慈”美德对于别人幸福、“谨慎”美德对于自己幸福的重要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弹性,现代社会一定是社会包容、经济自由的社会。也就是说,按照斯密的道德哲学,现代社会必定是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们互为条件、相互支撑、共同作用,推动整个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现代社会并形成一种与之适应的“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9] 252}。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的亚当·斯密,以其道德哲学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的思想基础。

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在人类每一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从轴心时代起,世界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的、或者说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10]如果说,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整个人类文明“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那么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的经济学说,则为整个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对此,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曾评价说,“只有 18 世纪,才能写出这样浩瀚而又深刻的作品。《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其它少数论文所共同显示的是,斯密绝非只是经济学家。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类动机、历史阶段和经济机制。……它是人类自身冒险的巨大概念的一部分。”^[11]英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罗尔在纪念《国富论》出版 200 周年时亦曾深刻地指出,“亚当·斯密是‘现代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他的书之所以值

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12] 9}

具体而言,按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研究结论,现代社会应该是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如果我们把它视为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论部分,那么同自己幸福密切相关的“谨慎”美德及其要求的经济自由与相应的经济学说,同别人幸福密切相关的“正义”美德及其要求的政治修明、法律严正与相应的政治法律学说,则构成了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应用部分。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的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尽管是理性主义传统的欧陆学者特别是缺乏足够理论视野的德国历史学派学者所难以理解的,但其实是密不可分、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亚当·斯密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正因如此,在完成《道德情操论》后,亚当·斯密始终念念不忘他的政治法律学说,并在临终前修订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1790 年)特别声明:“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不同革命……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我长期以来所计划的关于法学理论的部分,迄今由于现在还在阻止我修订本书的同样工作而无法完成……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它,因而我把 30 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在这里”。^{[8] 1-2}从某种程度上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他所计划的“这个大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整个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正文的开篇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13] 5, 11}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分工,而由此导致的产量大增能否“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

况”,则以政治是否修明为重要前提。由此出发,斯密围绕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普遍勤劳和资本积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构建了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秩序的理论经济学体系。首先,普遍的市场交易和自愿互惠的交易行为,“一个动物,如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与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说服手段……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13]13}其次,经济发展有赖于人们普遍地参与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而资本积累则为促进这种普遍勤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国民财富的增加“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13]315-316}最后,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9]252};另一方面,政府至少应该承担下述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9]252-253}

三、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发

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际,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曾在《向亚当·斯密致敬》一文中指出,“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广度、深度和光辉的成就与斯密相比,这就是马克思。确实,这样一个比较能帮助我们对斯密有一个适当的初步的认识。正像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把斯密仅仅看作经济学家是不对的”,并强调“试图在经济学家先哲祠内,为斯密确立一个适当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读《国富论》在某些方面像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因为我们会新发现,我们有多少共同的习惯用语来源于《国富论》,我们有多少基本短语来源于斯密的光辉的见解。亚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

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12]34,43}就斯密的经济学说而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鉴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说法,对其简要评价如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为经济学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从斯密开始,经济学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持续到今天的统一性;在经济学的每一次新的飞跃中,人们都会回忆起亚当·斯密,并在他那里重燃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14]如果说,斯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那么马克思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而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斯密那里重新燃起的火焰。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15],这显然是对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继承发展和进一步深化;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初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16]这显然是对斯密关于“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的进一步阐发和理论发展。事实上,正是在批判继承和创新斯密及其追随者有关经济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实现了经济学的新的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6}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有必要吸收借鉴斯密道德哲学及其经济学说的有益成果。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又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

产方式迭代升级的历史过程”,^[17]是一种涉及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乃至思想、文化、制度诸领域现代化的复杂现实运动,斯密关于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经济自由的道德哲学分析,无疑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8]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8}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同样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567.
- [3] 胡怀国.斯密思想体系及其经济理论[D].北京:北京大学,1999.
- [4]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2.
- [5]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3.
- [6]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
- [7] 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M].江畅,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
- [8]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0]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15.
- [11] 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64.
- [12]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3.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 [17] 胡乐明,胡怀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解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2):14-29.
- [18]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4.

责任编辑:武玲玲

Adam Smi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Hu Huaiguo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dam Smith constructed a moral philosophy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in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which not only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modernization, but also inspir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ntire human society with its academic ideas on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legal justice, so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freedom. As the founder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dam Smith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economics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arou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transactions, general industriousnes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in the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t not only provides questions and yardsticks for all the previous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of economics, but also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Adam Smith; Scottish Enlightenment; modernization